

中苏友好时期卡马河地区的中国工人:生活与适应问题*

[俄罗斯]K·M·谢尔盖耶维奇 著 臧 颖 译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苏友好关系时期卡马河沿岸中国工人的工作及生活事迹为主要内容,根据大量尚未出版的文献资料及访谈资料,全面讲述了中国工人来到苏联的历史过程、工作及生活状况、文化适应、民族认同,以及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方法与特点。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中苏外交关系发展中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历史上称为“中苏友好”时期。^①对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苏联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与意识形态上的合作伙伴,与其发展友好关系对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苏联而言,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对维护和提升自身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也具有重要作用。

中苏正式的友好关系始于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条约提出双方共同致力于彼此间的经济发展与合作。同年,又签署了关于两国间的邮政、电报和电话通讯合作,以及在中国播放苏联影片及河流航运事务等一系列补充协议。^②

在这段时期,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业援助。^③援助的项目之一是在苏联企业培养年轻的中国专家。从1950年到1960年期间,有11000多名中国年轻人在苏联接受培训,超过10000名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在苏联的工厂、企业参与生产实践。^④莫洛托夫州^⑤是当时中国工人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之一,有近1000名中国工人在该州居住,其中600名在莫洛托夫市,^⑥30名在别列兹尼基市。中国工人不仅对整个城市的经济与政治产生重要意义,而且他们对当地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此之前,该地区是一个对外国人相对封闭的地区,大批中国人的到访及长

* 本文为俄罗斯彼尔姆国立人文师范大学教师历史学副博士卡门斯基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Каменских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投给本刊的原创作品。该文得到了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项目“1950—1964年中苏友好时期卡马河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研究”(项目编号:14-11-59002)的资助。作者从事俄罗斯华人历史研究,已发表30多篇论文,著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拉尔中部地区的华人》一书,2012年被授予彼尔姆边区“优秀青年学者”称号。考虑版面问题,文中访谈内容不再一一引著,具体信息如下:1. 魏喜斌,男,1933年生;斯维特拉娜·彼得洛夫娜·魏,女,1945年生,魏喜斌的妻子。访谈时间:2007年,访谈地点:俄罗斯彼尔姆市。2. 季忠祥,男,1934年生;库兹涅佐娃·尼娜·费多洛夫娜,女,1949年生,季忠祥的妻子;扎瓦洛娃·娜塔莉亚·仲夏诺夫娜,女,1963年生,季忠祥的女儿。访谈时间:2007年,访谈地点:俄罗斯彼尔姆市。3. 阎宪林,男,1935年生。访谈时间:2007年,访谈地点:俄罗斯彼尔姆市。4. 张连登,男,1935年生。访谈时间:2007年,访谈地点:俄罗斯彼尔姆市。5. 张喜福,男,1935年生;诺莉娜·柳德米拉·格里高里耶夫娜,女,1940年生,张喜福的妻子。访谈时间:2009年,访谈地点:俄罗斯彼尔姆市。6. 张元祥,男,1930年生。访谈时间:2012年,访谈地点:俄罗斯别列兹尼基市。——译者

① Пын Мин.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й дружбы[Текст]. - М.: Изд-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 С. 268.

② Борисов О. Б., Колосков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екст]. -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0 г. С. 48

③ Филатов Л.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ценка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помощ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итаю. 1949-1966 гг. [Текст]. - М.: Наука, 1967.

④ Борисов О. Б., Колосков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екст]. -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0 г. С. 49

⑤ 现俄罗斯联邦彼尔姆边疆区,1940年3月8日—1957年10月2日被称为莫洛托夫州。——译者注

⑥ 现俄罗斯彼尔姆边疆区首府彼尔姆市,1940年到1957年被称为莫洛托夫市。——译者注

期居住对当地社会必然产生不小的影响。

在俄罗斯,学界对“中苏友好”这段历史时期,以及在这期间中国工人赴苏学习与工作的历史研究仍显不足。目前,此类问题仅仅在一些以华人在俄罗斯的历史为主题的专著和文章中有所体现。^①但是,近些年才发表的这些论著未能全面揭示出中国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因此,我们希望依靠大量的历史档案和访谈资料,能够全面揭示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中期卡马河地区中国工人的生活及工作状况,他们的社会适应与文化适应,以及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等问题。

关于这段历史时期最主要的及一些尚未公开的文献资料都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ГАРФ)、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彼尔姆边疆区国家档案馆(ГАПК)、别列兹尼基市档案管理处、别列兹尼基市历史艺术博物馆(БИХМ)。这些资料中包括中国工人赴苏联的文件,还有莫洛托夫建设总局向石油工业企业建设部(МСПИП)所作的关于中国工人的工作报告,以及中国工人在莫洛托夫市和别列兹尼基市的其他方面的资料。

文献资料还包括一些报纸,如《星报》(《Звезда》)、《别列兹尼基工人报》(《Березни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乌拉尔建设报》(《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等。此外,《赫鲁晓夫回忆录》^②也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非常重要的资料,因为上世纪50年初期他是中苏友好合作及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除了书面资料,在卡马河地区工作过的中国工人魏喜斌、张喜福、闽宪林、张连登、张元祥(音译)及他们的家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口述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使我们深入地了解中苏友好的历史,中苏关系快速发展及终止的原因,以及一些未披露的历史事实和真相。50年代初期,苏联做出让中国人来苏联工作的决定。对这一事件,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里(中国)有很多失业者,我们想吸引一些中国工人来我国开发西伯利亚东部的资源。”^③1955年4月26日,中苏经过两年谈判,苏联部长委员会通过了第816—488号“关于招收中国工人来苏联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劳动培训”的决议。^④按照这项决议及在其基础上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中国工人将参与苏联城市工业设施的建设。

招收中国工人及其派遣工作是由苏联部长委员会下属的劳动储备管理总局负责,为此,该部门专门设立了中国工人招聘局。同时,在莫斯科和北京分别设立了中苏委员会,负责中国工人的招募、组织过境和安置工作。

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向苏联提出接收中国工人赴莫洛托夫州大型国有企业[莫洛托夫工程总局、哈萨克石油工程总局、塔伊马兹石油工程总局、阿尔梅季耶夫斯克石油工程总局及第二大国有企业(别列兹尼基市)、东方石油工程总局等]工作的请求,并在以后的计划中逐渐增加工人数量。^⑤

在莫洛托夫市中国人被安排在一个名叫“巴拉托沃”的村子里(现为彼尔姆市的现代工业区),当时,那里是劳改中心囚犯居住的地方。苏联石油工业企业建设部当时决定疏散这些“特殊人员”,为中国工人改善居住条件。在莫洛托夫工程总局关于接收中国工人的筹备工作文件中有这

① 参见 Ларин А. Г.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Текст]. -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книга, 2009; Петров А. И.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1856 - 1917 годы [Текст]. -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ООО "Береста", 2003. ; Лукин А. В. Медведь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драконом.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и в XVII - XXI веках [Текст]. - Москва: АСТ: Восток - Запад, 2007. ; Дацишен В. Г. Китайцы в Сибири в XVII - XX вв.: проблемы миграции и адаптации [Текст]. - Красноя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8.

②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Текст] / Под. ред. Малютина А. Ю. - М.: Вагриус, 1999.

③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Текст] / Под. ред. Малютина А. Ю. - М.: Вагриус, 1999. С. 351

④ ГАПК. Ф. р. 1084. Оп. 2. Д. 12. Л. 2

⑤ ГАПК. Ф. р. 1084. Оп. 2. Д. 12. Л. 5

样的记录:截至4月1日,“特殊人员”(3月计划转移3400名“特殊人员”)已被疏散,为中国工人预留实际住所5200个。^①1955年春莫洛托夫市已做好接收中国工人的各项准备工作。

中国工人在访谈中谈起,去苏联工作要经过层层选拔,过程十分严格。既要考虑参选者的健康、出身、教育程度,还要考虑是否参过军,是否为党员和汉语水平等条件。

“先要体检,然后考察家庭成分和家人的职业”——中国工人张连登回忆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员,在农村工作,从家庭出身来讲,我非常符合要求”。别列兹尼基市第二国有企业中国工人张元祥说,党员和军人身份对他的人选帮助很大。据张喜福所讲,6000名山东志愿者中,最终只有300名入选。

中国工人乘坐火车前往苏联。魏喜斌是1955年到达莫洛托夫市的,他还记得去苏联路上的经过。上千人被安置在几个车厢里,一连走了好几天才抵达目的地。“在车厢里我们几乎没躺过,实在太累了就轮流躺一会儿。车厢里没有垫子,什么也没有,只能躺在几块板子上轮流休息。走了大概15天左右,中间停了很多站。到一些大站的时候我们才能下车吃点儿饭,在车厢里只能吃一些罐头食品,什么西葫芦罐头、菜豆罐头啊,只有罐头食物。”张喜福也是其中一名工人,他说,在去苏联的火车上,因为他个头小,所以被安置到锅炉房睡觉,车厢里根本没有躺着的地方。

接受我们访谈的中国人都谈到来苏联一路的艰苦,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此抱怨,因为他们心中对苏联充满了幻想和憧憬,强烈的赴苏愿望冲淡了一路的辛苦。闽宪林上中学时了解了一些关于苏联的事儿。他回忆道:“我们老师说,苏联是‘老大哥’,那儿和我们这儿不一样。我很惊讶,问他:‘有什么不一样?’老师说,苏联‘老大哥’的商店里没有售货员。我又问:‘没有售货员怎么行啊?人们去商店买东西,要结账的啊?’老师解释说,苏联‘老大哥’非常诚实,商品上标着价格,人们主动把钱放到付款台,自己按价钱取走找头,然后离开商店。我又问:‘如果人们少给钱,多拿了找头怎么办啊?’老师说,苏联‘老大哥’可不像我们这儿的人,很多人不太诚实。对苏联的这一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在苏联培训期间闽宪林一直戴着象征中苏友谊的徽章。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选择来苏联的过程:“1952年我中学毕业,1953年去当兵……1956年从部队复员。当时听消息说,有谁愿意去苏联帮助‘老大哥’建设共产主义,我想:这太好了!”

张连登也记得,当时很多人都愿意去苏联:“当时,大家心里都把苏联当做了‘老大哥’,年轻人都愿意去”。张喜福去苏联之前刚满18周岁,和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他放弃了当兵的念头一心想去苏联。他说,当时他听到关于苏联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很贫困,去苏联“老大哥”那里建设共产主义是所有人的梦想。他还说,自己5岁以前都不知道干粮是什么样儿,到了苏联之后他才知道吃饱的感觉。

1955年7月21日,第一批中国人抵达莫洛托夫市,共302人。^②1956年9月5日,第二批300人抵达。^③别列兹尼基市的中国人于1956年3月到达。^④到达莫洛托夫市后,中国人被安置在位于石油工人路的楼房里。后来,建设冈查洛夫路时,为中国人专门盖了一座大房子。巴拉托沃村的居民把它叫做“中国之家”或“中国宿舍”。“我们那儿曾有一座中国人住的房子,叫‘中国之家’,还有一个中国面包铺,我以前上学时经常去那儿。”扎瓦洛娃·娜塔莉亚这样回忆道。在别列兹尼基市,中国人自己盖了住房,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48号,大部分人都居住在这里。当地人把它叫做“中国之家”或“上海”。

① ГАПК. Ф. р. 1084. Оп. 2. Д. 12. Л. 12

②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20. Л. 78

③ ГАПК. Ф. р. 1084. Оп. 2. Д. 17. Л. 2

④ БИХМ. Ф. 215. Оп. 4. КП 4697/2

有关当时中国人社会人口方面的资料非常少。通过一些资料得知,抵达这里的中国人都很年轻。比如,第二批抵达莫洛托夫市的中国人的年龄:18—25岁有360人;25—30岁有165人;30岁以上有75人。^①“我们都是年轻人,最小的只有18岁,大多22—23岁,30岁往上的很少。”魏喜斌回忆道。过了几年,卡马河地区中国人的数量有所增长。至1959年,彼尔姆州共有1010名中国人,差不多占全苏中国人总数的5.3%。^②

在社会保险、退休保障、医疗服务、文化服务、休假及工资保障等方面,所有来苏的中国工人都能得到与苏联企业及建设单位工人同等的各项法律法规的保护。^③

每一位工人与接收企业都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用中、俄两种文字,合同期不少于3年,还可以延期。大部分工人被派到建筑工地工作。根据苏联石油工业企业建设部的报告,刚到苏联时,中国工人很难适应。1955年关于中国工人的工作报告中记载:“最初一段时间中国工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坚持三年,早点回国。因此,他们对待工作不太负责。”^④张喜福记得,最初因为工作繁重,再加上气候不适,很多人经常哭,想回家。苏联方面也尽量为中国工人创造一切条件,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苏联石油工业企业建设部直属莫洛托夫建设局领导1956年10月20日作出“关于对新一批中国工人进行生产技能培训”的指示中提到:“必需对中国工人进行生产技能培训”。^⑤中国工人被分成若干个工作队,每个队都指派一名掌握先进生产经验的教员。头三年各个工作队的队员都是中国人,后来,在第二期合同执行时就把他们拆散,分到不同的工作队去了。^⑥当地政府对中国工人的饮食也非常重视,通过文献资料我们了解到,中国工人刚来的头两个月,第一组的工人被安排在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第五食堂就餐,为他们专门布置了一个餐厅,为他们做可口的家乡菜。1955年年末,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的领导还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从中国为这里的工人带来花生、咸菜、醋、菜豆、西红柿等食品。^⑦

当时,中国工人的工资及物质待遇能达到当地企业工人的中等收入水平。关于这一点,接受我们访谈的工人家属都说,他们家庭的生活水平与其他人家并没有太大差别。

到第一年的年终,中国工人的劳动技能和职业素质都得到较大提高。通过苏联石油工业企业建设部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的工作总结等资料我们了解到,来苏联后的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工人工作队的生产率平均提高了1.5—2倍。比如,王义章(音译)所在的瓦工队,从1956年1月到当年8月,其生产率就从87%提高到177%。^⑧当地报纸也不止一次地报道中国工人掌握三种甚至三种以上劳动技能,以及他们在工作队中的突出表现和发挥的重要作用等情况。以梁义(音译)和H·И·古登门科为队长组成的“中苏共产主义工作队”更是广受赞誉。^⑨特别是为了迎接一些重大的节日或纪念日,中国工人与苏联工人一样,加班加点完成大量建设工作任务。^⑩别列兹尼基市的工人张元祥通过三年努力,获得了推土机手、司机和焊接工三项职业技能资格证书。^⑪

① ГАПК. Ф. р. 1084. Оп. 2. Д. 17. Л. 4

② ГАПК. Ф. р. 493. Оп. 19. Д. 20

③ ГАПК. Ф. 1084 р. Оп. 2. Д. 12. Л. 32

④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20. Л. 81

⑤ ГАПК. Ф. р. 1084. Оп. 1. Д. 201. Л. 257

⑥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20. Л. 92

⑦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20. Л. 92

⑧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20. Л. 61—62, 99—100

⑨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58. 22 июля

⑩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58. 30 сент.

⑪ ВИХМ. Оп. 3. Д. НВ 2110/9.

《乌拉尔建设报》曾刊载一篇文章,作者描述了他眼中中国工人一天的工作场景:“无论刮风下雨,中国工人都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身上充满了共产党员所具有的饱满热情……他们从不抱怨劳动的艰苦,从不拒绝任何交给的工作。”

几位中国工人在接受我们访谈时也提及,当时,他们比当地苏联工人的干劲还要高。“人们都夸我们中国工人干活好。”——魏喜斌回忆道,他当时是一名拖拉机手——“那时,我什么活儿都干。哪儿有累活儿,就把我们派到哪儿。我们不停地工作,两班倒。每个队分成两个小组,轮班干活,甚至半夜也不休息。”张喜福也记得,当时连睡觉的时间都不足,早上7点上工,晚上11点才能回到宿舍休息。在中苏友好时期举办的各类社会主义竞赛中,共有43名中国工人获得奖章。^①

中国工人参与了莫洛托夫市许多大型项目的建设,如第六热电厂、石油加工厂房、和平大道,还有卡查洛夫大街几座楼房的建设。^②而在别列兹尼基市中国工人几乎参与了20世纪后期当地所有工业项目的建设,其中最大的项目是新花园工厂和新镁工厂。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工人对当地建设的贡献较之所具有的经济意义,其所包含的政治色彩更为浓烈一些。

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工人在适应方面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障碍。据资料记载,1955年来苏联的那批人完全不懂俄语。1957年的《乌拉尔建设报》中刊登:“最初,实习生们在各方面并不顺利。由于掌握专业技能需要俄语知识,所以,他们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俄语。”^③该报也报道过中国工人的说法:“在工作中我们无法和苏联工人交流,弄不明白该怎么做,都是因为我们不会俄语造成的。”^④

1956年开始对中国工人进行扫盲。1956年莫洛托夫工程总局领导给部长的报告里写道:“目前,去年来的中国工人正在成人学校学习俄语。”^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企业领导请求增派1—2名翻译,并为中国工人邮寄一批汉语技术书籍、汉语影片和中国乐器。

在1956年的“关于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直属建设局中国工人生产及生活状况”资料中记载:“由于培训过程中缺少专业教材和翻译人员,使得中国工人在技术学习方面困难重重”。^⑥中国工人说,他们刚来的时候几乎一句俄语也不会。“一开始非常难。”魏喜斌回忆道:“不知道哪一种工具怎么说,一直用手比划。大家经常问:‘这个怎么说?这个怎么说?’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据张元祥的回忆,由于不懂语言和缺乏培训,一开始工作对他来讲非常难。

为了便于在工作中沟通和交流,根据中文名字的发音给每位中国工人们起了俄文名字。1958年《乌拉尔建设报》曾刊登:“除了自己的中文名字,每一名中国工人还有一个俄文名字,比如:尤拉、廖尼亚、萨沙、米沙、郭力亚等。”^⑦闽宪林在讲到自己的俄语名字时说:“他们问我:‘你叫什么?’我说,不知道怎么说。‘那用俄语怎么说?’我也不知道。‘那就叫你米沙吧。’”从那以后,这个俄文名字就伴随闽宪林的一生。

中国工人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就克服了语言障碍。到60年代初,他们的俄语已经“说得很不错了”。^⑧但是,据一些中国人回忆,会写俄语的人并不多,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汉字都不会写。魏

①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20. Л. 82

②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59. 30 сент.

③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57. 18 янв.

④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59. 30 сент.

⑤ ГАПК. Ф. 1084 р. Оп. 2. Д. 17. Л. 6.

⑥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20. Л. 90

⑦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58. 22 июля.

⑧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63. 1 окт.

喜斌说,他在中国几乎没学什么就来苏联了。来苏联后,他才慢慢学会了说俄语。“我一直也没学会写俄语,以前还会写一些汉字,现在全都忘记了。我曾给家里写过信,现在什么也不会写了。”闽宪林说。

关于中国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况在很多资料中都有记载。接收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工作热情和成绩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和个人卫生问题。“中国工人来到之后,许多人患了沙眼、结核病,几乎 100% 的人得了肠虫病。”1955 年莫洛托夫工程总局“关于中国工人生产工作年度报告”中记载了这方面信息。^① 而在该年度“关于莫洛托夫中国工人生活条件”的报告中记载:“工人们的房间卫生状况非常差,脏内衣和上衣都挂在床垫子下面的铁丝网上……工作服挂在房门口走廊上……餐具散乱地堆放在厨房的架子上。”^②还记录了一些工人不遵守宿舍管理规定的行为。^③ 中国工人在苏联工作的整个过程中,这些现象都被记录了下来。

对中国工人来说,另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饮食。他们抵达苏联之后就自己做饭。“商店里有卖中国人喜欢的食品,品种很多,但我们更愿意在宿舍做饭。”魏喜斌讲道。

中餐也受到周围俄罗斯人的喜爱,他们对中餐很好奇,而且中餐食品也很特别。“我父亲经常在家做中国菜。我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有 40 多个人来我家做客,他们都想尝尝我爸爸做的中国菜。”——季忠祥(音译)的女儿扎瓦洛娃·娜塔莉亚回忆道——“我喜欢看他做饭,翻来翻去的。有土豆、肉馅,还有白蘑菇、黑蘑菇等等。”柳德米拉·诺莉娜也讲起,她丈夫经常下厨,做一些对苏联人来说非常独特的饭菜,比如萝卜炖猪肉、糖醋肘子、肉炒瓜皮(арбузные корки с мясом)等。她说,亲朋好友非常喜欢吃。

后来,许多中国工人逐渐适应了当地的饮食习惯。闽宪林对我们讲,后来他回过中国,他父母看到他吃生鱼(咸鱼)时惊讶得不得了。他父母问:“怎么能吃生鱼呢?”他说:“不是生鱼,是咸鱼。”父母又问:“又没煮,又没炸,怎么不生呢?”他们从来没听说过俄罗斯的腌肉。据这些中国工人的妻子回忆,他们的爱人很喜欢做饭,特别是过节的时候,都要亲自下厨。柳德米拉·诺莉娜还记得他爱人怎么做中国抻面。季忠祥的女儿扎瓦洛娃·娜塔莉亚说:“我特别喜欢看我父亲做面条,抻来抻去,再配上土豆、肉和蘑菇什么的,大家都喜欢吃。”^④所有接受访谈的中国工人的妻子们都说,那个时候做饭都是女人的事儿,男人抢着做饭感觉很奇怪。

中国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生活。莫洛托夫工程总局 1956 年工作报告中记载:“中国人经常去巴拉托沃村的俱乐部,在那儿看俄罗斯电影和话剧,他们还学会了跳舞。在俱乐部里经常见到与中国工人跳舞的俄罗斯姑娘。他们待人非常有礼,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工作一年后每个人都买了西装、外套、手表,有些人还买了自行车和其他一些东西。他们生活很节俭,不喝酒,60%—70% 的人都不吸烟。”^⑤据其他资料记载,有 40 名中国工人参加了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的合唱团,25 人参加了舞蹈团,18 人参加了杂技团,13 人参加了民族舞蹈团。他们还经常自己组织一些体育活动。莫洛托夫工程总局关于中国工人生活服务方面的一份资料记载:“夏季有 120 人参加篮球队,31 人参加排球队,88 人参加田径队;冬季他们积极参加滑雪、滑冰等项目的活动。”^⑥在当地俱乐部里,中国人经常表演中国传统戏剧、演奏民族乐器等。1961 年在州艺术节上,中国工人还表

① РГАЭ. Ф. 8897. Оп. 1. Д. 91. Л. 78.

②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19. Л. 247.

③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20. Л. 83.

④ 扎瓦洛娃·娜塔莉亚·仲夏诺夫娜,库兹涅佐娃·尼娜·费多洛夫娜,2007 年访谈内容。

⑤ ГАПК. Ф. р. 1084. Оп. 2. Д. 17. Л. 6.

⑥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20. Л. 83.

演了中国民间筷子舞。^①

1957年5月3日在别列兹尼基市电力工人文化宫举办了一场中国青年晚会。晚会上中国工人表演了合唱、京剧、舞蹈,还播放了影片。^②由中国工人组成的“国企1号”篮球队特别有名。^③在莫洛托夫工程总局工作过的中国工人回忆,他们庆祝所有的民族节日,包括传统节日和一些新节日,如春节、中秋节、八一建军节、国庆节等。魏喜斌讲:“我们组织晚会,穿上民族服装,演奏民族乐器。我们的领导也亲自表演乐器演奏。”中国工人的子女们对节日有很深的记忆。“我有一张照片——扎瓦洛娃·娜塔莉亚说——过节时,中国人踩高跷游行,这样的庆祝方式对俄罗斯人来说太特别了,但是他们以此来表达自己兴奋和愉快的心情。”^④中国工人在当地也能够充分享受本民族的文化生活。在节日里,中国元素的文化形式也引起当地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中国工人还积极与当地人沟通和交流,几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结婚了。1957年12月30日在巴拉托沃村中心俱乐部为5对新人举办了婚礼。新人是发动机工刘旺德(音译),朝鲜战争英雄,退伍军人,与来自索契的共青团员塔吉娅娜·维尔什尼娜;混凝土工杨继文(音译)与女工娜捷日塔·顿科诺;木工王继明(音译)与女工安娜·谢多娃;混凝土工刘雪峰(音译)与女木工玛尔塔·库尔加诺娃;车工高超(音译)与汽修厂女焊工尼娜·科仁娜。按照中国传统,新婚夫妇在胸前扎一朵红色的牡丹花丝带。“他们的婚姻是中俄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与日俱增的最好证明。”^⑤扎瓦洛娃·娜塔莉亚说,考虑到跨国婚姻的特殊性,专门为中国工人的妻子们开办了中文学习班。“课堂上不仅教她们汉语,还专门为她们讲一些生理学知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都瘦瘦的、小小的。这是我妈妈给我讲的。”^⑥《星报》和《乌拉尔建设报》还专门针对这种婚姻家庭的孩子撰写了文章。^⑦在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直属学校专门为这些家庭的孩子开办了教他们学俄语和汉语的班级。^⑧

在别列兹尼基市,最先结婚的是张元祥(音译)和他的同行张传修(音译)。别列兹尼基市第二国有企业领导以及所有中国工人出席了这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婚礼。^⑨新婚夫妇结婚后就获得了住房。在别列兹尼基市,10年中共组建了20多个中俄婚姻家庭。

关于中国工人和当地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从工程单位向部里呈交的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之间从没发生过直接的冲突。原因之一是,中国是苏联对外政策上的盟国;原因之二是,上级指示莫洛托夫工程总局,要保证中国工人最大的工作量。正因如此,中国工人赢得较高的社会声誉并获得当地居民的尊重。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由于人事科统计失误,由中国人周峰(音译)带领的抹灰工作队没领到全额工资。这件事引起领导高度重视,经过查实,很快就补发给中国工人们工资。中国工人在工作期间一共递交了4份投诉信,投诉的事情很快得到解决(比如作业面防护措施不到位,生活条件需要改善,以及增加工资等问题)。^⑩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负面事件发生。一年之后,2名中国工人张国军(音译)和王臣(音译)从莫洛托夫市被遣返回国。苏联相关部门给中国东北边境机关发去一封密函,请他们派人前

①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61. 21 февр.

② БИХМ. Ф. 215. Оп. 2. Д. 17. Л. 1.

③ БИХМ. Ф. 215. Оп. 2. Д. 16. Л. 1.

④⑥ 扎瓦洛娃·娜塔莉亚·仲夏诺夫娜,库兹涅佐娃·尼娜·费多洛夫娜,2007年访谈内容。

⑤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57. 4 янв.

⑦ 参见 Звезда. 1959. 1 окт.,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59. 30 сент.

⑧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60. 15 июля.

⑨ Березни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7. 1 июля.

⑩ ГАПК. Ф. 1084 р. Оп. 1. Д. 201. Л. 195.

来接收这两名中国工人并将他们投诉到河北省人民法院。^①

1956年2月16日莫洛托夫工程总局领导在给部领导的信中对遣返中国工人一事作了如下说明:

张国军为人不诚实,在中国工人会议上两次对其进行批评……我们也采取一些方法对其进行教育,但他并没有改正缺点,对待工作很不负责……他还破坏对中国工人提出的各项纪律和要求。他不服从工作队队长和工程主任的安排,甚至对主管领导的调遣也拒不服从,也包括对时任莫洛托夫工程总局副局长、中国工人领队孙同志吩咐的事情置若罔闻。^②

信中对中国工人王臣的情况陈述如下:

他的不当言行引起苏联人的反感。1955年12月9日他住院期间,据他所说,因为医生没有及时回应他的呼叫便身穿病服擅自离开医院。^③

除此之外,还发生其他一些小事。有一次,中国工人党国忠(音译)把一名联合机手给打伤了。还有一次,几名中国工人没买票就偷偷溜进了电影院。^④

以上事件毕竟只是个例,整体上说,中国工人在苏联期间的感受还是很愉快的,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是比较典型的。^⑤这种关系也是中苏亲密的外交关系的结果。文献资料记载,60年代初之后,两国关系出现危机,形势急转直下。50年代,在一些州级报刊和其他一些刊物上经常报道关于中国工人的信息,在中国的国庆节时还出版特刊表示祝贺。但是,1960年之后关注中国人的刊物数量急剧减少,在中国国庆节时也只是刊发官方性的贺词。另外,1963年《乌拉尔建设报》发表了题为《不应在友谊之间设置障碍》的文章。文章作者说,有一名叫热尼亚的中国工人,在回国休假后将一本反对苏联的书籍带了回来。该文作者指责中国政府和工人背叛苏联,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⑥

1963年夏天,大多数中国工人返回了祖国,具体日期已无从考察,但最后一次返乡日期在1963年10月的当地报纸上有记载。^⑦对中国工人的返乡,官方的说法是第二个三年合同到期。中国人自己也这么说,虽然他们也承认,主要原因是中苏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化状态。在彼尔姆,大约50个有了家庭和孩子的中国工人留了下来,有些家庭因为中国工人回国而解散。张喜福记得,其中有一个中国工人就被迫离开已经组建的家庭。在火车站他逃出车厢,在熟人那儿躲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到家人身边。这件事儿被公开后,允许他留在了苏联。从1964年开始,地方报刊就不再报道关于中国人的消息了。“谁留了下来,谁结婚了这些事再也不报道了,那时候中国已经开始文化大革命了。”阎宪林说。他还提到,中国工人要得到配偶的同意才能离开家庭返回中国。

留下来的中国工人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专门研究苏联华人史的俄罗斯学者В·Я·波尔恰科夫研究得知,1966年之后来到苏联的中国人,逗留时间都没超过15年。^⑧留在彼尔姆的中国人用一生的命运展示他们在异国他乡生存与适应的过程。几乎所有留下来的人都留在原单位工作,有些人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还继续工作。他们都有了子孙后代,他们的子女虽然具有中国人的体质特征,比如单眼皮和黑头发,但他们的民族认同却是俄罗斯人。扎瓦洛娃·娜塔莉亚说,她父亲想

①②③ ГАПК. Ф. 1084 р. Оп. 1. Д. 201. Л. 279-289, 279-289, 279-280.

④ РГАЭ. Ф. 8837. Оп. 1. Д. 720. Л. 83

⑤ Гончаров С. Н. 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 - кто они? [Текст]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3. №4. С. 15.

⑥⑦ Уральская стройка. 1963. 1 окт.

⑧ Портяков В. Я. Н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Текст]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004. - № 3. - С. 42.

教她学汉语,可是她自己不想学。^①中国工人之间尽量保持着联系。斯维特拉娜·魏回忆到,她丈夫经常与同胞见面,特别是与自己同县的老乡。但是这段时间他们和祖国的联系基本中断,也没有机会回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加入苏联或是俄罗斯国籍,这给许多人在办理各类证件时造成很多麻烦,而且他们自愿放弃一切福利和待遇。据他们的亲属回忆,有人曾劝这些留下来的中国工人入党,这样的话就可以公开批判中国政府。“很多人被说服了,但是我父亲拒绝了。他说:‘我不反对你们,但我也不会反对自己的祖国。’他一直没有国籍。”扎瓦洛娃·娜塔莉亚在采访中说道。^②

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与俄罗斯又重新走到一起,在彼尔姆的中国人终于获得了回国的机会。他们几个家庭组织起来一起回到祖国,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他们还与那些在1963年离开苏联的老工友们见了面。扎瓦洛娃·娜塔莉亚讲道,那时离开苏联的人,在苏联学到了扎实的工作技能并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中国得到了重用。“那些离开苏联回中国的人,在工作岗位上都升职了。我和我父亲去中国时,看到他们在单位从事的工作都不是一般的,他们的职称都不低于工程师。”^③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工人在苏联工作和生活这段历史时期,目前还没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从一个经历了贫困和连年战争蹂躏的国家(中国)来到一个“封闭的”苏维埃社会,这些中国工人受到了苏联人民热情的接待,这种热情甚至超越了“友好”关系的框架。而这些中国人在保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的同时,逐渐适应并接受了当地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他们在工作中、生活中,以及在与他人交往中展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特有的方式,也因此影响和感染着身边的人们。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与中国人通婚的家庭中,培养出的孩子是“中国化”的。但事实表明,这些中国工人的孩子们到第二代就完全“俄化”了,在他们身上仅仅留下中国人的外貌和体质特征。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了解到,在“中苏友好”关系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在另一个民族文化环境中适应生活的路径与模式。如今,中国移民遍布世界多个国家,移民引起的诸多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所提供的这段历史为研究中国移民的民族认同提供了很好的实证资料,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对其后代,即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对自己出身的看法有进一步的了解,也为我们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来帮助中国移民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ny unpublished sources, this paper tries to give a full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Chinese workers who came to the Molotov region in the 1950-60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ir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their cultural adaptation,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way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local society.

(臧颖,助理研究员,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哈尔滨,150010)

[责任编辑:吴家多 包胜利]

①②③ 扎瓦洛娃·娜塔莉亚·仲夏诺夫娜,库兹涅佐娃·尼娜·费多洛夫娜,2007年访谈内容。